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

第十五辑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

第十五辑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 第15辑: 多种文字/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634 - 7275 - 8

I. ①朝… II. ①中… ②北… ③延… III. ①朝鲜 - 历史 - 研究 ②韩国 - 历史 - 研究 IV. ①K312. 07 ②K312. 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8502 号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 (第十五辑)

编 辑: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李宝珠

封面设计: 金胜铉

出版发行: 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 133002

网址: <http://www.ydchs.com>

E-mail: ydchs@ydchs.com

电话: 0433 - 2732435 **传真:** 0433 - 2732434

发行部电话: 0433 - 2733056 **传真:** 0433 - 2733266

印刷: 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875 **字数:** 455 千字

印数: 800 册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5634 - 7275 - 8

定价: 48. 00 元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会刊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成镐（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

委员：（17名）

古代史部分：李宗勋（延边大学） 陈尚胜（山东大学）
孙卫国（南开大学） 李花子（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 苗 威（东北师范大学）

近现代史部分：宋成有（北京大学） 石源华（复旦大学）
金成镐（延边大学） 权赫秀（辽宁大学）
王明星（烟台大学） 崔凤春（杭州师范大学）

当代史部分：张珺瑰（中央党校） 姜龙范（天津外国语大学）
魏志江（中山大学） 李春虎（上海外国语大学）
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

本辑执行主编：金成镐

副 主 编：李宗勋 朴灿奎 金光熙

目 录

古代史

1. 貊人史迹探微/苗 威 (1)
2. 朝鲜半岛早期国家历史新探/李春虎 (20)
3. 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碑及其研究状况/耿铁华 (39)
4. 3—5 世纪东北亚诸民族·政权的关系研究
——以高句丽中期历史为中心/孙 泓 (59)
5. 渤海国遗民及其后裔流入朝鲜半岛诸事考/孙炜冉 (79)
6. 十一—十四世纪的中朝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
——兼评费正清所谓“华夷秩序”论/魏志江 (99)
7. 试论朝鲜王朝时期服饰禁制/朴延华 孙丽娟 (115)
8. 朝鲜时代赴日通信使文献价值的再发现/王鑫磊 (132)
9. 朝鲜《燕行录》著者爱戏辨析/王政尧 (151)
10. 朝鲜王朝北方“六镇”之稳城镇的设立/刘 阳 (171)
11. 概论清与朝鲜典型封贡关系确立的原因及表现/陈 放 (186)
12. 从范畴演进特点看中韩两国传统哲学的异同/李 虎 ... (204)
13. 韩国与中国近 30 年百济史研究述要
——以对外关系史研究为中心/冯立君 (220)

近现代史

14. 日本明治维新与朝鲜甲申政变之比较/姜秀玉 (249)
15. 福泽谕吉与朝鲜甲申政变/王明星 (266)

16. 东亚视角下的孔教运动/金俊 …………… (282)
17. 试论 19 世纪后期基于朝鲜地缘价值观的中日两国纷争
/于海君 …………… (293)
18. 19 世纪末朝鲜独立协会运动与“中华观”的嬗变
/金成镐 李岩 …………… (312)
19. 朝鲜人李光失踪迷案/崔凤春 …………… (338)

当代史

20. 苏联的选择与中朝关系的形成(1945—1953)/余伟民 … (347)
21. 关于中韩建交之际各自相关方关系的调整/郑信哲 …… (364)
22. 鸠山内阁推进“共产圈外交”与日韩关系/安成日 …… (373)
23. 中韩共同应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现状与展望/许寿童 (391)
24. 中朝“唇齿关系”的确立与弱化/王海凡 …………… (405)
25. 韩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李冰 …………… (420)
26. 六方会谈的特点、绩效及未来趋势/仇发华 …………… (435)
27. 吉林省对朝经贸合作现状分析及对策/王圆 张玉山 (451)

其他

28. 生命不息 科研不止——永远怀念父亲孙进己/孙泓 (470)
29. 孙进己先生科研成果目录/孙泓 …………… (492)
30.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2013 年学术年会纪要/金成镐 李花子 (521)
31. 会刊《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十四辑发表论文、
资料目录/金成镐 …………… (524)

貂人史迹探微^①

苗 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貂人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地方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在叙述朝鲜古代史时常常涉及的问题,而由于他们在地域上跨越了今天之图们江和鸭绿江,因此在中朝古代关系史中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本文以貂族的考古文化为重点,探讨貂人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文明状况。

【关键词】貂;秽;民族

据我国史书《大戴礼记·少闲篇》及《史记·五帝本纪》载,远在我国传说时代的虞舜时期,东北地区同中原的交通路线即已经开辟,山戎、北发(亦称“发”)、肃慎这三大原始族群就曾到中原“来服”。其中山戎分布于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北发分布于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中部和东南部以及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而肃慎则分布于今长白山东北部地区。在夏、商时期,他们同中原一直保持着朝贡关系,但至少商代晚期,这三个原始族群便经过发展变迁,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民族共同体,并程度不同地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些民族的名字,被《逸周书·王会篇》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BZS014 阶段性成果,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12JHQ033)阶段性成果。

记录下来,其中的“发人”就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民族。发人亦简称“发”,也就是“貊”(亦作貉),有的书上写作“亳”,保留了古“北发”、“发”的族称,但地域仅包括今医巫闾山西麓,向东达清川江北岸,向北包括今朝鲜慈江道地区以及我国浑江下游、太子河上游地区,南至渤海和黄海。

—

发人地区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辽宁省本溪县庙后山洞穴和营口市金牛山洞穴。前者地层堆积有8层,在第4~6层中出土有人工遗物,其年代在40~14万年前,该遗址伴生的动物群有些种属颇为接近于北京周口店动物群。这里出土的大量肿骨大的角鹿化石与周口店发现的典型种几乎完全一样,而硕猕猴化石也很典型。从时代上来说,该遗址与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的年代大致并行,但出土的石器种类却不同。金牛山下层的年代由化石动物群推定为中更新世后期,出土的石器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情况相同,都是利用脉石英和石英岩制作的,石器中也有若干个小型尖状器,足见金牛山下层文化与周口店石器文化有关。^①

发(貊)人地区远在距今7000年即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从新乐遗址下层、后洼遗址以及小珠山遗址考古发掘便可知其大概。

新乐文化主要分布于沈阳地区的辽河和浑河流域,而沈阳新乐遗址下层遗存则是其代表一定布局的聚落。人们居住在平面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的房屋里,居住面中央有灶。有一座

^① 张镇洪:《辽宁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初步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9卷,1981年第2期;[日]加藤晋平:《人类向东北亚的扩展》,晓霞译,《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较大的房址面积近 100 平方米,很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从该遗址内出土的石斧、石镞、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来看,彼时已有了定居农业,而较多的细石器和石镞、网坠的发现,反映了渔猎经济仍占有较大的比重。石器的制造,细石器占三分之一,打制石器最少。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最多,约占全部陶器的 90% 以上,火候较低,胎质疏松,泥质陶的数量很少。器形主要是一种大口筒形深腹罐,有少量和红山文化相似的斜口筒形罐,平底呈椭圆形。这些器形胎壁均匀,造型规整,可能已使用慢轮制陶。器表大都有文饰,多属蓖纹系统的竖“之”字形的线纹,并有少量的弦纹。值得提及的是,新乐下层文化利用抚顺煤精制成的圆形耳珰,圆泡制品,是我国煤精雕刻艺术最早佳作,开拓了煤精工艺的先河。另外,在一座房址中出土了一件木质鸟形雕刻品,刻工精细,刀法流畅,亦应是我国早期木刻艺术的杰作。^①

后洼遗址位于辽宁省东沟县马家店乡三家子村后洼屯东的台地上,可分上下两层。下层遗址距今约为 6000 年左右,发现房址 31 座,大房址 7 米见方,小房址为圆形,直径 3~4 米,均为半地穴式。从出土的打制石锄及磨制的磨盘、磨棒看,人们已从事农业生产。从出土的磨制石镞、石球、石网坠以及陶网坠来看,渔猎经济亦占重要地位;而出土的陶纺轮,表明人们已有纺织手工。其陶器以红褐陶和红陶为主,还有黑褐陶,手制,火候较高,器形以直口筒形罐为多,其次为壶、碗、杯、勺等生活用具。罐和壶的腹部上端往往有对称的瘤状耳。纹饰以压印蓆纹为主。从出土的舟形器来看,人们已学会造船,并以之为水上交通工具。工艺品有石刻鱼纹图像和石雕人头像、猪头像、兔与回首鹤等 40 余件。这一文化分布在丹东地区大洋河以东的黄海沿岸,向北延伸到鸭绿江流域的蒲石河流域。后

^①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3 页;李恭笃:《试论辽宁地区几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关系》,《新乐遗址学术讨论会文集》,1983 年。

洼上层遗址已发现房址 12 座,亦均为圆角形半地穴式。陶器多夹砂红陶和黑褐陶,纹饰以刻划文为主,器形有罐、壶、碗以及网坠、纺轮等;石器有打制的石球、网坠,磨制的有磨盘、磨棒、斧、镞等;艺术品有陶塑人头像等,其年代距今约 5000 年左右。这类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域较广,在丹东、本溪、鞍山、海城均有发现。^①

小朱山遗址在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中部吴家村西小珠山的东坡,可分三层。下层距今为 6000 年以前,与沈阳新乐下层文化相当,并有共同之处。从出土的压磨制石斧、石刀和石磨棒看,人们已经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而从出土的打制石网坠以及鹿骨(为多数)、犬骨、獐骨、贝壳等看,人们仍然是以渔猎为主;从出土陶纺轮看,纺织应是其重要手工业。陶器皆为手制,泥条盘筑,为夹砂黑褐陶和红褐陶,并多含滑石粉,器形较单纯,为筒形罐,纹饰主要是压印的竖“之”字纹与类似编织纹。中层距今为五六千年,有建筑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有柱洞和灶址。从出土的打制石镞、磨制石镞、打制网坠以及鹿、狗、猪、獐等动物骨骼、大量贝壳来看,人们的生产还是以渔猎为主;而从出土的打制石铲、石刀,磨制石斧、石磨盘、石磨棒来看,兼有一定的原始农业;从出土陶纺轮看,亦有纺织手工业。值得关注的是,出土的陶器除了本地特色的刻划纹筒形罐以及壶、钵外,还有山东半岛东夷族的鼎、三足觚形器等大汶口文化风格的遗物,证明东夷人同辽东地区有着海上的文化交流。上层距今为 4000 年以上,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颜色颇为少见。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有一定的农业经济。从出土的陶制扁鬲足与环形足的盘式鼎和镂空豆来看,该地的居民与山东半岛东夷人的海上文化交流仍在继续。辽南地区属于小朱山下层文化的主要遗址,在长海县广鹿岛有柳条沟东山遗址、大长山岛有上马石遗址下层和新金县塔寺屯遗址等。属于

^① 许玉林:《后洼遗址四十多件原始图腾石雕和人形陶像》,《光明日报》1987 年 5 月 18 日。

小朱山中层文化的,在长海县广鹿岛有吴家村遗址、旅顺口区郭家村遗址下层。属于小朱山上层文化的,在长海县广鹿岛有王屯蛎碴岗南窑遗址、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新金县双塔桥东遗址以及旅顺口区老铁山积石墓等。^①

总体来看,小朱山遗址这三层文化自身特点明确,发展关系清楚,其文化地理因素独特。但是,这一文化与外地的文化也并非没有联系,其中层和上层分别有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因素,下层与沈阳新乐下层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某些共同处。值得关注的是,辽南地区的海上交通在新石器时代业已开辟。据考古发掘,在丹东后洼遗址下层、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遗址、大连市旅顺口区郭家村上层等皆发现了“舟形陶器”,这些舟形器可能是一种艺术器,或是一种明器或玩具,说明彼时这里的居民已学会制造、使用舟船。在上述遗址中发现有石斧、石镞等,人们完全可以用火和这些工具制造独木舟。在辽东半岛黄海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石制、陶制等各种类型的网坠,尤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网坠形体较大,显然这种网坠是用于较大渔网上的。在郭家村上层遗址中除了出土大量浅海鱼类外,还发现了诸如鲨鱼等深海中鱼类的骨骼,说明彼时居民的捕捞作业已扩展到更为广阔的海域,而独木舟用于海上交通亦有足够的物证。小朱山中层文化中的郭家村下层、小朱山中层、吴家村等遗址中出土了盆形鼎、罐形鼎、实足鬻、三足觚形器等,均为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器类,而小朱山上层文化即郭家村上层文化中出土了蛋壳黑陶、三环足器、三扁鬻足鼎、高裆鬻、镂孔豆等均为山东半岛龙山文化器类;同样的,山东半岛的胶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某些文化

^① 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旅顺博物馆:《大连新金县桥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2期。

因素,如烟台的白石村、蓬莱紫荆山、长岛的大黑山岛北庄、北城隍岛的山前等遗址中,有小朱山中层的那种刻划平行斜线纹、叶脉纹、网格纹等直口筒形罐。从考古资料还可以看出,辽东半岛的古代居民向东和东北与朝鲜半岛有着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例如,韩国庆尚南道蔚山郡新岩里、釜山东三洞、东莱多大浦等遗址中,发现有小朱山下层和后洼下层文化的那种压印席纹和“之”字纹,而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西浦项等的刻划纹中,有一种双勾涡纹(朝鲜称为螺旋纹)与小朱山中层和山东半岛蓬莱紫荆山双勾涡纹彩陶图案花纹是一致的;甚至俄国远东地区海参崴大彼得湾查伊桑诺夫遗址中,也有小朱山中层那种刻划纹直口筒形罐,还有辽南地区丁家村下层那种弦纹乳丁纹饰。^①

从考古学提供的各种信息看,发(貊)人的先民早在传说时代就同中原地区有来往,还是完全可信的。

二

貊(发)人应是青铜时代的古代民族,其先人在夏商皆与中原存在着朝贡关系。及周武王灭殷,迅速接管了殷朝的所有土地,并分封诸侯,使其经营全国各地。据《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武王克商之后,曾宣布:“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其中“亳”,即指发(北发),说明商、周时期,发人即已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了。又据《逸周书·王会篇》载,在周成王时期,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建成,发人同东北各族皆派出代表参加了周天子召集的“成周之会”,所进献的贡品是一种像鹿一样善于迅走的动物“麋”。

^① 许玉林:《从辽东半岛黄海沿岸发现的舟形器谈我国古代舟船的起源与应用》,《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在西周前期,发人同姬姓燕国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彼时东北诸族同中原的来往,燕国在发挥着纽带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燕国承担了对东北诸族的羁縻性的管辖工作,包括发人在内的东北诸族,皆相安无事。及西周后期,由于北方民族的崛起,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而燕国对东北诸族的管理亦力所不及。但到了周宣王(公元前 827—前 782 年在位)时期,又出现了“中兴”之世,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诸族的管辖,尤其是对秽、貊地区的管辖,起用“固安”(今河北省固安县)之韩的后裔“韩侯”治理“北国”,在貊人地区新筑“韩城”。据《诗经·韩奕》提供的资料,韩侯赴任之后,在秽、貊地区开沟引水,治理田亩,制订税则,发展生产,秽、貊之人皆安居乐业、感恩戴德,纷纷向周天子进贡。其贡物有白狐皮、赤豹及黄熊等。但是,西周晚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腐败,逐渐失去人心,周幽王遂被申侯和犬戎所杀,西周灭亡,而韩侯之国亦土崩瓦解。燕国将其势力退至燕山以南,包括貊人在内的东北诸族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阶段。

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辽西诸族崛起,严重地威胁着燕、齐等国的安全,齐桓公(公元前 685—前 643 年在位)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联合其他诸侯国进行北伐,使包括貊人的辽西诸族遭到沉重打击。而原居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东胡族趁机南下,占领了辽西地区,同化了包括貊人在内的辽西诸族,东胡族成为“古山戎”地区的统一民族,其东界以今医巫闾山与辽东的貊人为邻。

辽东貊人地区的青铜时代要比辽西地区晚,但该地深受夏家店下层文化、殷商文化和山东半岛岳石文化以及后来东胡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各地区先后程度不同地发展了青铜文化。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看,夏家店下层文化曾越过医巫闾山向辽东的貊人分布区延展,至少到达了今浑江流域。在抚顺望花遗址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青铜时代遗物,其中陶器以三足陶鼎为主,也有鬲、甗、甑、罐、壶、盆等;抚顺施家东山遗址发现了商末的遗物,陶器有鬲、鼎、壶、罐等;抚顺孤家子商末遗址出土上甗下鬲之陶器,其风格与夏家店下层文

化绳纹陶甗相似;抚顺小青岛遗址发现较多的陶鼎,而鬲处于次要地位,其中的大型筒式鬲,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的小型筒式鬲极为接近,其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周初。此外在抚顺大甲邦后山鹰嘴砬子遗址、东州村石油二厂东山遗址等,也都出土了同类的典型器物。关于商文化的影响,可以从前述望花遗址出土的青铜环首刀得以证明。该器与安阳殷墟和山西石楼子所出商代青铜环首刀相似。^① 医巫闾山以东的辽河、浑河流域的早期青铜遗存,还有康平顺山屯遗址和墓葬、法库大山屯遗址、法库湾柳街遗址、沈阳新乐遗址上层等等,这些遗址中均出土有足陶器,显然是受夏家店下层文化或上层文化的影响。而在法库县柳湾街村发现的两件青铜斧和一件青铜钺、一件青铜削,却具有浓厚的商文化色彩。辽东半岛早期的青铜文化有位于大连市旅顺于家遗址下层和上层,属于前者的年代距今 4000 年左右,属于后者的年代相当于商周时期;此外还有长海县上马石遗址上层等,其年代距今为 3000 余年。从考古发掘得知,在早期青铜时代,辽东半岛同山东半岛依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来往。例如,辽南地区双坨子一期文化的磨光黑陶、浅盘高柄镂孔豆、大把杯、弘纹乳丁罐等,都有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些特点。双坨子二期的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和黑灰陶为主,纹饰为弦纹、凸棱纹,器形有尊、盂、豆、器盖、壶等,陶器特点多子母口、折肩、折腹,这些皆与山东岳石文化颇为相似。^② 至于于家村上、下层代表素面黑褐陶、黑皮陶器和具有陶簋造型和彩绘几何纹和卜骨的出现及骨器的发达,亦表明山东半岛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的重要影响。^③ 从商末到周初,辽西地区的古山戎、山东半岛的古东夷以及殷商华

① 抚顺市博物馆考古队:《抚顺地区早晚两类青铜文化遗存》,《文物》1983 年第 9 期。

② 许玉林:《辽东半岛商周时期青铜文化概述》,《辽海文物学刊》1989 年第 2 期。

③ 王绵厚:《高句丽与秽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

夏之族,通过陆路和海路,移民于辽东地区者恐不在少数,他们皆融入了貉人之中,而所带来的先进文化,亦促进了貉人社会的发展。

然而,从貉人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来看,接受东胡族以青铜曲刃短剑为代表器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则更为突出,其时代多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青铜文化的遗址,在下辽河地区属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前后的代表性遗存是沈阳郑家洼子遗址和墓葬,其青铜文化与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十二台营子类型关系密切,青铜短剑有 T 字形剑柄,共存的器物群以青铜马具较为发达,而刀囊斧囊饰牌以及背面正中附长方桥形钮的大、小镜形饰及双钮铜镜颇具特色。稍晚的战国时代青铜文化遗存有沈阳南塔出土的一件残断的曲刃短茎式剑身和法库石柱子村出土的一件 T 字形铜剑柄及加重器。在辽东半岛地区,属春秋时代者有“双房类型”,主要分布在旅大地区以及以北的辽阳、本溪、抚顺,北限可达浑河北岸一带。其中以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为代表,辽阳二道河子、清原门脸、李家堡子和抚顺甲邦后山石棺墓等,均属这一类型。其青铜短剑形体短小,剑体轻薄,且铜质较恶。共存的青铜制品常见者为束腰、扇刃、长身并有数道凸弦纹的铜斧,但不见马具和装饰品之类。其稍晚者有以旅顺后牧城驿岗上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双台沟遗存亦属此类。曲刃青铜短剑出现了富有地方特征的船型铜制剑柄及其枕型加重器,而从共存器物来看,青铜器物种类和数量都较双房类型明显增多。岗上不但出土 6 件曲刃短茎式青铜短剑和一件铜制剑柄端,而且还有铜矛头、铜镞、铜马衔、铜钏、铜筭及铜饰片等 10 余件青铜制品,并发现滑石制的斧、剑柄端、凿和泡的铸范四件,表明彼时生产力水平和冶铸工艺均有提高和发展。其年代应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前后。辽东貉人的青铜文化的第三发展阶段应是燕国建立辽东郡以后的战国晚期,其代表性的遗存是旅顺后牧城驿楼上墓地,而刘家疃石椁墓、郭家屯窖藏、官屯子塋周墓、长海县上马石贝墓、金县卧龙泉墓、海城大屯和抚顺市针织一厂遗存等,均属这一阶段的青铜文化遗迹。这一阶段青铜短剑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 T 字形剑柄和磨工精致的加重器,共存的青铜器物,不论马县、生产工具,还是装饰品,较前期又有明显增多。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楼上墓地还发现了三枚明刀钱以及铁镰和铁器残件,证明貊人已迎来了铁器时代的曙光。^①

各种迹象表明,辽东貊人形成之后,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和发展,其社会经济以及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进步,社会结构与居民的生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群之中开始了阶级分化。貊人的社会生产首先是从其先民“古发人”以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而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仅从辽东半岛早期青铜遗存出土的磨制石斧、双孔石刀、石镰、石铲来看,貊人的农业生产已比其先世大大跨进了一步。另外,据《孟子·告子下》载:“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饗饗,无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足见貊人已有了较为原始的“农业税”。仅从大连地区的考古发现看,在新石器时代郭家村上层就出土了一席筭的炭化谷物“黍”;在青铜时代的甘井子大连湾大咀子遗址上层房址中出土了六陶罐炭化谷物,其中就有高粱和粳稻。在沈阳新乐遗址亦发现过黍。^② 貊人的手工业亦有长足的发展,从出土的诸多青铜器以及石范来看,其青铜冶炼及铸造业颇为发达;从出土的诸如罐、壶、豆、杯、碗、钵、尊、盂、瓮、簋、鼎、甑、鬲等来看,制陶业亦有相当的进步,并且出现了彩绘镂空轮制技术;从石器的制造来看,磨光、钻孔技术普遍推广,器型亦丰富多样,有斧、斨、双孔石刀、环状石器、镞、网坠、镰、纺轮、矛、凿、棍棒头、铲、砍砸器、刮削器、石磨盘、石磨棒、剑等;骨器制造也颇受重视,出土的骨器有锥、针、铲、凿、管、钓针、竿、

① 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② 许明纲:《大连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刘俊勇:《辽宁大连大嘴子稻谷、高粱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鱼钩、镞等；从出土的铜制斧、凿以及石制同类器物看，貂人的制船业以及木材加工业也较为发达。从发现的房址看，人们的居住条件亦颇有改善。例如，于家村上层下 F，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残长 4.60 米，宽 3.00 米，距地表 1.10 米。四壁用土堆筑，西侧有一段不规则石墙，房址周围有深浅不一、按内外圈分两排排列的柱洞，屋顶为木骨草拌泥红烧土，房西北角有灶坑。^① 双坨子一期文化的房址有单室和双室，门一般向南，室内为红烧土硬地面，房顶用椽涂抹草拌泥，为一面坡式平房。室内用陶壶口埋入地下作为灶址。双坨子三期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有的是在穴内四壁砌石墙，有的有门和台阶式门道。房址大小不一，均用木檀和椽搭成屋顶，四壁有木柱。^②

从考古发掘来看，貂人的养殖业与渔猎业亦是颇受重视的产业。从发现的诸多青铜马具以及殉牛腿、牛头、狗头的情况看，家畜的饲养是较为普遍的；至于渔猎业的发展情况，从出土的铜制和石制、骨制相关武器和工具即可窥其一斑。

从古文献的记载看，貂(发)人曾越海同山东半岛的齐国进行贸易。《管子·揆度篇》载，管仲对齐桓公曾说：“发、朝鲜之文皮，一篋也”。在同书《轻重甲》中亦说：“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毳服而以为币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可见，貂(发)人出口的货物主要是虎豹之皮。另外，貂人与邻近的东胡、朝鲜以及秽人、高夷亦当有以物易物的贸易来往，尤其同朝鲜、东胡的交流，更为密切。

考古界根据沈阳郑家洼子出土的青铜器判定，该地区的狩猎和征伐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占据重要地位，阶级已经形成，社会进

① 许玉林等：《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 年第 1 期。

② 抚顺市博物馆考古队：《抚顺地区早晚两类青铜文化遗存》，《文物》1983 年第 9 期。